

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

〔法〕加斯东·加恩著



务 印 书 馆



K₁

彼得大帝时期的 俄中关系史

(1689—1730 年)

〔法〕加斯东·加恩 著

江载华 郑永泰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 年·北京

Gaston Cahe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1689—1730)**
Librairie Félix Alcan, Paris, 1912

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
(1689—1730 年)

〔法〕加斯东·加恩 著

江载华 郑永泰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13 5/8 印张 356 千字
1980 年 3 月第 1 版 198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300 册

统一书号 11017 · 460 定价 1.25 元

出版说明

法国学者加斯东·加恩的这本著作，对于研究早期的中俄关系史极为重要。它自从 1912 年出版以来，一再被各国研究中俄关系史的学者所引用。

我们曾于 1961 年出版过本书的中译本，叫做《早期中俄关系史》。它是从舍尔顿·李治(Sheldon Ridge)的英译文转译的。现在我们根据法文原著(巴黎 Félix Alcan 出版社)重新翻译。这次恢复了本书的本来面目，补译了参考书目和全部脚注。由于脚注所占篇幅很大，放在页底有所不便，现改附在每章的末尾。注释中的拉丁文、荷兰文和德文的引文已全部译成中文，以便我国读者查阅。

1980 年 1 月

序 言

十八世纪俄中关系史以两种类别不同的文件为基础：其一是俄国文件，其二是中国文件。第一步的工作是分别研究这两种文件，把每一种文件所提供的资料加以对照，衡量每一件资料的价值，对所有资料都作严格的审查。下一步是将这样双管齐下进行分析的结果，放在一起核对和比较；在俄国档案材料与中国历史材料一致时，史实由于两种独立存在的证据相一致而被确认为有根据；在有分歧的情况下，必须研究差别的原因，并且寻觅事实真相。这是最理想的方法。不幸的是现今这部作品未能完全采用这种方法，而且恐怕这种方法还会长期得不到充分的应用。

俄国方面的文件数量如此丰富，可是编入目录和分类的却又如此之少，以致目前逐一加以研究不仅不可能，甚至不能全部通读一遍。试把这个几乎还未开采的宝藏很快地浏览一下吧。关于本书的主题，莫斯科外交部的档案包括有：（1）中国事务，有一个简目；（2）喀尔木克事务，蒙古事务，等等；（3）“穆勒材料袋”。前两部分按年排列，可能是依据早在十八世纪末叶的尼·班蒂什—卡缅斯基的分类法编写的，而后来的增补有时使得原来的大纲变得模糊不清（请参见后面的书目）。“穆勒材料袋”塞满了西伯利亚各城市的档案抄本、译文、注释，等等，简言之，这些名目繁多的文件是由历史学家格—弗·穆勒西伯利亚之行（1733—1744）带回来的，或者是他回来后为他的著作而搜集的¹。这些材料大部分存放在莫斯科，有一部分放在圣彼得堡。这些文件数目相当多，品种相当杂，因此应当有一份专门的分析性目

录。至于档案本身，只要想到自 1689 年至 1730 年四十年间涉及对华关系的外交部档案至少有二万至二万五千页手稿，就可想见其数目之巨大²！

然而，外交部的档案只不过是这一历史时期俄国官方文件的一部分。除了枢密院和俄国宗教最高会议的文件外，有关西伯利亚中央与地方行政管理，以及它的商业等文件，原先放在西伯利亚的“Prikaz”（类似西伯利亚事务处或西伯利亚部，1637 年至 1763 年），后送往莫斯科的司法部档案馆存放。这些存放文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但是，司法部该不是保存十七与十八世纪有关西伯利亚档案文件的唯一的地方。纵使西伯利亚各城市的档案在存放它们的木头建筑物失火时大部分烧掉，有一部分还可能被抢救出来，或留有抄本，保存在当地或其他地方。如果没有一份俄国档案的总目录，这种目录实际上也没有，如果没有人对所有的图书馆，不仅是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亚洲博物院图书馆，等等）和莫斯科的图书馆，而且包括西伯利亚，乃至全俄国的所有图书馆，亲自去作一番搜索，那么，怎么可能了解到剩下些什么呢？

如果说国家的文件还没有完全分类编目，更不必说出版，那末，私人文件又从何谈起呢？这些文件是核对官方的论断所不可少的。私人回忆录、传记、私人记事会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可惜与这段历史时期有关的这类文件几乎是空白，而且恐怕今后不会有更多的发现。

极其丰富、分散、不完全为人所知，这就是俄国档案的现状。中国方面的情况就不同了。这段历史并不缺少文件，可是这些文件既没有汇集，又没有全部译出和加以审查。本书作者曾打算本着上述精神去着手研究这些文件，并把它们与俄文史料对照。但是，作者在远东患了重病，迫使他放弃了汉学的研究，而

只局限于研究已经译出的文件。这一局限和欠缺起初似乎并不太严重。通常中国的编年史对官方最突出的事件只是干巴巴地记载寥寥数语，有关俄中贸易部分一点详情都没有，而私人回忆录提供这方面资料的可能性很小。从翻译过来的编年史片段来判断，除去一些人名和日期外，它们的作用非常有限。不参照俄国文件，几乎不可能对双方外交谈判或商务谈判的起因、过程及结果形成某种概念。极其凑巧，另一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至少有一次是这样。俄文档案中有关 1712 年至 1715 年派往伏尔加下游土尔扈特人处的中国使团的记载，只谈到派遣使节路过西伯利亚和欧洲俄国的一些日期和琐事。但是，使团首脑之一，满人图理琛用满文和汉文写了一本详细的有关中国使团的书。他的书很荣幸地有四种西方译本：一本法文译本，两本俄文译本和一本英文译本。同样由于非同寻常的巧合，法国耶稣会教士张诚神甫，身为中国官方译员深深地卷入了 1688—1689 年的俄中谈判，对种种事件作了详细的记述。他的论述为俄国大使公务日志所证实或更正。这两位彼此无关的西方证人就这样逐日记录了各种事件，一个在俄国方面写下了为他的行为辩护的必要细节，另一个在中国方面用具有科学精神的准确性来写书。这样的资料是最理想的资料，使人遗憾的是相同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

俄文档案大部分是手稿，中国文件几乎没有译出，这段历史的主要来源的情况就是这样。除了这些资料以外，喀尔木克的和蒙古的史料阐述了散处在俄国与中国之间的各民族的变迁，这些民族在两个帝国的政治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同中国的史料一样，除去少部分外，直到那时为止，喀尔木克的和蒙古的史料既没有收集起来，也没有翻译过。仍然同中国史料一样，这些史料记载得非常枯燥无味，而且比中国史料更不准确，只有经过译者的对比和解释以后才能提供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料。

因此，这部十八世纪俄中关系史所依据的只是一部分俄国官方档案和一些译自中文与蒙文的材料，这些材料够吗？

如果涉及的是一部不再更改的著作，那当然不够。可是这本书并不企图达到这个目的。本书的目标仅在于取得某种进展，明确地提出一些问题，但并不总能加以解答。假如这本书只能指出问题的复杂性，指出在某几点上我们的知识所受到必然的限制，和当前所能达到的地步，它的作用似乎就不是无用的了。

或许正是由于有所抑制和为自己划定界限，这样一本著作才在表面广度上虽嫌不足，但在坚实可靠上却可以得到弥补。因此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责难它所倚靠的官方材料的片面性。对于俄中政府间的关系，国家档案似乎是最好的史料来源，之所以最好，那是因为在俄国和在彼得大帝时期，是由中央政权控制一切政治事务的。它甚至要管理商业事务，不但靠发布同时期法国科尔贝尔*那样的通用条例和繁琐的规定，而且对商业直接干涉及进行官方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里找到有关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商务资料是不足为怪的，官方材料似乎很能说明这些商务来往。

国家档案对于研究俄国财政部商队的历史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了解竞争性贸易是有用的，而由于在俄罗斯，国家就是一切，或者想充当一切，并且由于在这一情况中，国家损害私人利益而自己充当商人，留下了它自己的商务帐册和有关它的竞争者秘密进行交易的点滴情况，因而国家档案更具有特殊价值。

因此，十八世纪俄中关系特别表现在商业、经济和海关方面。但是，在和平还没有来保证两国之间经常性的自由贸易之前，为了铲除困难，消灭误解，找到相互满意的方案及相互谅解

* 科尔贝尔 (J. B. Colbert, 1619—1683)，法国路易十四时的财政大臣。——

的办法，必须通过外交进行多次交涉。继起先的围攻、冲突和战斗之后，一个平静的纪元在1689年左右来临，它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外交的任务是为了结束流血的交锋，为了以和平竞争代替暴力和武力。然而，不找出俄国和中国在政治、经济利益方面所采取的行动的动机，就不容易理解外交工作的成果。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形成十七世纪俄中战争与十八世纪的和平之间的过渡阶段：商业和外交是这一演变的两个因素。这一演变便是本书研究的对象。

注 释

1 有关穆勒和班蒂什—卡缅斯基的生平，他们在保存档案以及研究俄中关系中所起的作用，请看参考书目。

2 柯罗文大使自1686年至1690年的公务日志，共有2,522页；萨瓦·务拉的思拉维亦大使自1725年至1729年的公务日志有2,172页；他的助手、负责边境事务的专员斯捷潘·阔留赤甫在1894年仅三本公务日志就有8开本的手稿6,588页。1726年共有各种文件23本；1727年有29本；1728年有24本；仅仅在这三年中就有76个本子或76束文件。

目 录

序言	1
绪论 十七世纪末叶俄中两国间的竞争	1
第一章 柯罗文·费要多罗的出使(1686—1689)	14
第二章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俄国的远东关 税政策	43
第三章 尼布楚条约订立以后的俄中早期关系; 伊兹勃兰德·义杰斯(1692—1695)	63
第四章 十八世纪最初二十年间在中国的俄国商 队	84
第五章 图理琛的出使下伏尔加的土尔扈特 (1712—1715)	109
第六章 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俄国和喀尔木克人 的关系	130
第七章 伊兹玛依洛夫的出使(1719—1722)	152
第八章 从伊兹玛依洛夫到萨瓦·务拉的思拉维 赤; 郎克(1721—1725)	173
第九章 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的出使(1725—1728)	194
第十章 1727—1728年的商队; 彼得大帝逝世时 边关的改组	240
第十一章 中俄宗教关系: 东正教会在北京	262
结论	291

原始文件·····	297
参考书目·····	356
译名对照表·····	412

绪 论

十七世纪末叶俄中两国间的竞争

从十六世纪末叶到十七世纪末叶，俄国派往中国的仅有两位使臣和两次官方使团；从1730年至1850年，派过两位使臣和三次商队。但是从1689—1730年间，俄国使团或使臣出使中国却不下于四次，而且其中有一次的规模及重要性远远超过其它各次；这期间，中国使臣出使过一次，俄国官方商队来过十二次左右。为什么这四十年间外交和商业来往异乎寻常的频繁呢？这些来往导致了什么结果呢？

在整个十七世纪，俄国穿越西伯利亚，一直推进到黑龙江流域。在十七世纪中叶，它似乎已经在外贝加尔区建立了固定的居留地¹，即市镇或修道院，这样，它就与截然不同于西伯利亚西部和中部游牧民族的邻邦中国，面对面地相遇了。它马上就同它的邻邦进行外交的和武力的接触。莫斯科曾两次派遣使臣到北京来，一次是巴伊阔夫，他于1656年3月3/13日²到达北京，同年9月4/14日才离开；另一次是摩尔达维亚人尼果赖，于1676年5月15/25日到达中国首都，并停留到1676年9月1/11日³。介于巴伊阔夫使团和尼果赖使团之间的二十年间，俄国可能曾两度派遣官方使节前往中国：一次是由塔拉的“贵族之子”伯夫列夫和不花刺人阿勃龄携带一封致中国皇帝的信离开莫斯科，信件的日期是1658年3月10/20日，于1662年11月1/11日回到莫斯科⁴；第二次只由阿勃龄一人单独回到中国，这是1668年至1672年间的事⁵。这些

俄国早期的外交使节，负责去同中国建立和平的商务关系，结果都失败了⁶。这是由于中国人不欢迎这两位使节本人，而且也因为对于中俄两国在黑龙江流域的持续斗争和流血冲突感到烦恼。哥萨克人和冒险家们在黑龙江沿岸建立了雅克萨城；他们的首领之一哈巴罗甫顺河而下，被阻于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处，并被迫与中国人作战（1652年3月24日/4月3日）；另一首领斯特帕诺甫被围于呼玛尔斯克要塞（1655年3月13/23日），可能于1658年6月30日/7月10日被中国人擒获⁷。另外有两件事更使中国人愤怒：一件是一个中国属民的改信东正教，另一件是雅克萨城的重建。约在1667—1670年间，有一个叫根忒木耳的通古斯王公带着他的家人和奴仆逃到俄国人那里，俄国人就给他们洗礼，并且拒绝把他交还给中国人⁸。于是中国人就在雅克萨的俄国人身上报复：中国人自1683年8月10/20日起就包围该城，1685年6月12/22日攻下该城。以亚列克西·托尔布新为首的雅克萨城的保卫者，虽撤离该城，但，该城不久就得到重建。一支生力军由一个波兰或德国贵族拜顿率领，重又攻打回来，于1685年8月27日/9月6日用泥土和木料建立起新雅克萨，这座城市于1686年春天已开始耸立。1686年7月7/17日中国人兼程前来包围该城，于7月15/25日杀死托尔布新，并且进行严密的封锁⁹。

不过，中俄双方都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方面对于俄国外交上的试探曾多次去信答复，但是都没有结果，理由很明显：这些信件有些从来就没有送达目的地，要不就是几年以后才送到莫斯科宫廷¹⁰。不过，发出这些信件，就足以表明存在着妥协和修好的意愿。这是因为在十七世纪末叶，中俄两国都要求和平。不过，如果说，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与中国的利益相一致，因而可以获致同样的和平解决，但各自的原因却完全不同。所以，应该对它们一一加以分析。

俄国从最初与中国发生关系时起，就让人家看出它想从与它的邻邦的接近中捞取些什么。给尼果赖的训令（比给巴伊阔夫的训令更为世人所知）表示得很清楚：和好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就是商业。俄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未来的市场。中国被认为是出产金、银和贵重布匹的地方。西伯利亚盛产毛皮，并且臣服俄国的西伯利亚各民族又都把毛皮无偿地作为贡品送到俄国朝廷；用这些毛皮交换中国商品会获致多厚的利润！俄国由于行政改革，机构扩大和在西方的历次战争，国库日渐空虚，急需中国的金银。只要俄中两国政府能够达成协议，两国间的贸易得到保障，它就必然会给俄国方面带来可观的利益。但是要想使这种希望不致落空，金银锭和硬币就必须全部归国家所有。应该只有国家才能够支配商业活动，并使这种商业带来所期待的全部利益。不过，如果皮毛贸易在中国是这样的有利可图，那么很多人就都想染指。私人会把这种权利让给国家吗？国家肯允许商人独吞各种硬币和全部盈利吗？如果国家干预这种交易，是否会产生妨碍和毁坏这种交易的危险呢？如果竞争对国家不利，国家又怎能不监督这种业务呢？如果仅由国家来进行俄中贸易，它将以何种方式来管理这项业务呢？国家把这种特权让出，招人承办，要在什么条件下呢？如果这种商业由皇家垄断并依靠代理人来进行，是否合适呢？如果这样作的话，路程如此遥远，又受可获巨利的詐欺行为的诱惑，应该用何种方式来有效地管理这些代理人呢？俄国政府由于受到对华贸易可获巨利的吸引，因此冒着与私人、官吏以及各种经济上的劲敌竞争的一切危险，自充官商，从事贸易。

受到内部竞争威胁的官方贸易，还不断受到对外政策的打击。中国方面，在看待自己与“北方蛮夷”的关系上，所持观点与俄国完全相反。使中国发生兴趣的是政治关系，并不是商业——商业只不过是私人的事务。中国长期以来的政策是在国境四周以进贡部族

来确保边境安全。十七世纪末叶，介于中俄之间有三种主要民族：在西部，在伏尔加河河口及乌拉尔河流域的是土尔扈特人；在鄂毕河和叶尼塞河发源地一带的是喀尔木克人或厄鲁特人；在外贝加尔区的则是蒙古人。土尔扈特人在种族上与喀尔木克人相亲，最初定居于准噶尔，后来于十七世纪中叶迁移到伏尔加河下游；在十七世纪末叶时，其首领阿玉气汗，成为阿斯特拉罕和乌拉尔河之间的各游牧民族的最高领袖。俄国总想法使他成为自己的附庸；连续订立的几个条约表明，这纯属幻想。在西伯利亚的另一端的蒙古人，1686年于基兰·布迟尔地方召开的议会上，由于感到自身太软弱孤立，于是决定委身于中国。可是，随着喀尔木克人逐渐向东推进，他们的地位变得更不稳固了。厄鲁特人是在野心勃勃的首领们领导下的战士，他们居住的地方正控制着从南部进入西伯利亚以及从西部进入中国的各条道路，因此他们有独霸中亚细亚之心。十七世纪末他们降服了突厥斯坦的不花刺人，并使他们成为自己在外交和商务上的代理人，他们又自己充当西藏的保护者，保卫喇嘛佛教，使之免受中国黄教支派的侵害。在把中俄两国隔开的各个民族中，实际上只有厄鲁特部族对这两个帝国真正构成威胁。

中国是了解这一点的，为了易于压服厄鲁特人，中国着手运用全力去孤立他们。鉴于蒙古人已经依附于中国的宗主权之下，中国此时所要做的只不过是使这种从属关系成为不可分离的而已。土尔扈特人对于与他们信奉同样宗教的中国人方面的召唤，是不是会比蒙古人更为冷淡呢？土尔扈特与喀尔木克首领之间的竞争，使得土尔扈特人也置身于反对厄鲁特人的行列中。在西方人和亚洲人之间，在游牧的佛教信徒和信正教的俄国人之间，必不可免地发生摩擦，这结果会不会使他们与俄国疏远呢？中国的外交任务似乎由于这种情况而变得容易完成了，只要知道如何加以利用。

厄鲁特人由于既和蒙古人又和土尔扈特人对立，除了从俄国方面外，得不到任何支援。这种可能性是可怕的。中国因此有必要以一切代价来阻止敌对双方联合起来，因为它们的联合力量将会非常强大，足以破坏努力的均衡而损及中国的利益。喀尔木克人由十七世纪末叶起，作为敏感的亚洲人，不断地考虑着这种联合会产生什么作用，一直在散布着这方面的谣言，并且要求建立这种联合。但是俄国对于厄鲁特人也不过是和其他通过条约附属于它的游牧民族一样看待，它萦回不已的仅仅是自己的商业利益。因此俄国接待了喀尔木克人派来的代表不花刺人，并在与他们进行贸易时给予优待；而对于喀尔木克人本身，则只要求他们在从属关系方面作出外交上的保证。

俄国人和厄鲁特人的这种关系，当然逃不脱中国的密切注意。中国当然不会因他们之间的敌意而不快，而且中国还可能在设法挑起这种敌意。因此，得到中国人友谊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俄国方面至少应该严守中立。而有关俄国和厄鲁特人互派使臣和成立协议之事稍有谣传，都会立刻使中国人改变他们的友好态度，并且狂怒起来。为了对抗俄国人，中国掌握了一项足以打击敌人弱点的武器，那就是收回给与俄国的各种商业上的特权。中国在政治上对俄国的不满，很快就会表现为阻挠俄国人进行贸易，愤懑则表现为与俄国经济关系的完全破裂。但是中国人不能同时与厄鲁特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又与俄国人发生公开的敌对行动。因此中国的策略就不得不是使它的两个敌手中的一个解除武装，以便转而与另一个为敌。如果我们说俄国所以希望与中国保持和平是为了它的商业利益，那么中国所以同样希望与俄国达成谅解，就是为了它在中亚细亚的政治利益。

虽然中俄两国的愿望相同，但是经过最初几次会晤没有能够达成协议。中俄两国花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才用一个性质较

为广泛的条约补足了第一个和约。这是因为直到十七世纪末叶，两国尚未开始彼此了解。俄国把中国人视为半野蛮民族，称中国皇帝为“可汗”，对他的尊称仅是“阁下”而不是“殿下”；而中国则妄想对这些“北方的蛮夷”行使宗主权，正如它对其他地方的蛮夷一样。由于彼此互不了解情况，俄国和中国甚至对于他们本国的幅员和各自的领土都搞不清楚。俄国对于西伯利亚只有一些极其粗糙和极不精确的草图；而中华帝国连一幅地图也没有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它们除了把知名市镇附近的几个点作为边界外，还能划定什么边界呢？因此首先是中国，接着是俄国，都要花时间来对本国领土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地图。如果我们说中俄两个帝国被迫不得不从事精确的地形测量是外交为科学服务，那么，为求正确地相互估计以及公平地划分边界而去了解这两个国家之举，同样有益于外交。

达成协议的条件本身要求能交换意见和进行讨论。但是，在十七世纪末叶，俄国人既不识满文，也不懂汉文；同时中国人也一点不懂俄文。在中俄官方通信和进行外交商谈时究应采用哪种语文呢？中国人是很熟悉蒙文的，俄国人由于与外贝加尔区的布利亚特人接触的缘故，学蒙文比较方便，因此蒙文似乎是很合用的；可是，不知道是由于俄国人的无知，还是由于耶稣会教士阴谋的结果，最后却选中了拉丁文。这样一来在两个宫廷之间，耶稣会教士既充当了译员，又能够得知国家的机密。中国方面是出于需要而聘用他们；俄国则设法争取他们，他们同俄国在宗教信仰上如果不是全相一致，那就是颇为相似。在十七世纪末叶他们曾向俄国请求让教会信件和教会人士得以自由通过西伯利亚。这些不都是俄国可以笼络他们的条件吗？耶稣会教士的地位始终是脆弱的。耶稣会教士在北京是受到宽容的，但也受到猜忌，略遭怀疑，稍有轻举妄动，都会使他们丧失性命。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会不了解俄